

聖王之道

先秦諸子的經世智慧

鄧國光 著



中華書局

聖王之道

先秦諸子的經世智慧

鄧國光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聖王之道:先秦諸子的經世智慧/鄧國光著. - 北京:中華書局,2010.5

ISBN 978 - 7 - 101 - 07222 - 8

I. 聖… II. 鄧… III. 先秦哲學 - 研究 IV. B220.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12390 號

責任編輯:朱立峰

聖王之道——先秦諸子的經世智慧

鄧國光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8%印張·2 插頁·115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22.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7222 - 8

序

《聖王之道——先秦諸子的經世智慧》是為通觀中國思想而寫。東周以至漢初，是中國思想長河之中至為浪濤洶湧、波瀾壯闊的一段天險。不論從哪個“通孔”觀察，都是最具創造力、最有生氣、最令後世神往的一段歷史。大江之所以滾滾遷流，千姿百態，源泉混混而已。源泉是本，失本難以持久，灰飛煙滅，自難避免。源薄河淺，本厚葉茂，乃自然之理。諸子思想，澎湃源於根本。本書深探根本，因源及流，方始而究，本末縱橫，通觀原生學術的智慧，揭示華夏學術的“經世”情懷，傳其本源之道於來葉，仰承先哲賢聖，唯盼不至及身而絕。

全書四章，說“王道”、“理”、“聖王”與《春秋》，用以顯豁“經世”意識的源流。首揭“王道”大義，溯源《尚書·洪範》，揭示平平的公道乃東周以來諸子經世的根本道理。諸子以“道術”經世，皆不離“王道”。本“王道”以通觀諸子的經世智慧，則本末具顯，而“道術”為可知。“王道”本來平坦，是人人可循的大道，易行之至；“道術”本非秘訣，易知之至。易知易行，遷善背惡，公道彰顯，此乃經世的大理。次揭“理”之為先秦、兩漢共用的“經世”話語，以啟經世的門戶，並理清向來專屬宋學與清儒的論爭。“道”、“理”並陳，則原生學術之體用

關繫為之具現。第三章重新發掘諸子共同期待的“聖王”之義，此乃經世思想所寄託，而“道術”實踐之歸宗。東周至漢初諸子皆有期於“聖王”，彰彰在目。漢以後息微，於今無聞，以至於諸子深期的“聖王”之道竟旁落於世俗信仰與東瀛漫畫！今復原“聖王”之道，本經證經，周照本源，不為泛論。“王道”大義，因“聖王”而著。第四章闡明“王道”乃《春秋》的根本，為東周諸子所共仰，非儒門“專屬”；抵破“專屬”一家的學術成見，方能照見諸子活躍的生機；申明《春秋公羊》義理，以彰顯獨尊意識之下的思想餘暉。

筆者積學耽思四十年，本書不妨視為筆者治學人生的階段性總結。但學術的長河滔滔而流，波濤相覆，風雲不止，唯盼拙著之梓行，未至侮損人類寶貴的生存資源。

非常感謝學術界朋友的鼓勵，以及中華書局和張繼海博士的支持。歐陽艷華小姐幫助我詳核資料，減輕了拙稿對讀者的誤導程度，在此併致謝忱。

鄧國光

2009年10月序於澳門大學中文系

目 錄

序	1
---------	---

第一章

王道：先秦、漢初“道術”原論	1
敘引 王官之學與德性自覺的進程	1
本論一 周、秦《尚書·洪範》義的流播	9
(一)考察東周時代運用《洪範》的情況	9
(二)諸子運用《洪範》之考察	16
本論二 先秦“王道”義的發揚	36
本論三 “道術”並存的思想世界	43
餘論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正義	56

第二章

經世義理：先秦、兩漢載籍“理”義探勘	66
敘引 問題的提出與研究的狀況	66
本論一 先秦經傳諸子“理”義的流變	69
(一)溯源：《詩三百》、《左傳》、《周禮》、 《逸周書》的用例	69
(二)秉公去私：《管子》與《孟子》的“理”義	72
(三)窮理盡性：本源天地的《易傳》“理”義	79
(四)道德熏陶：《墨子》“理”義	82
(五)超越成見：《莊子》外、雜篇“情理”的 精神世界	84
(六)立政行教：《荀子》的“理”義	90
(七)治術心法：《韓非子》的“道理”	96
(八)黃老治術：《黃帝四經》、《文子》的 “天理”與“人理”	100
(九)父慈子孝：《鶡冠子》的“人情物理”	104
(十)政治符號：《呂氏春秋》“分理”與 李斯的“理”	107
本論二 兩漢載籍“理”義的流變	111
(一)暴政鑑戒：陸賈《新語》啟途與賈誼《新書》 “六理”的美政	111
(二)循理而動：《淮南子》的“理治”	114
(三)永恆不變：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理”義	118

(四)通理成德:楊雄的《法言》、《太玄》 的“理”義	126
(五)因理制物:嚴遵《老子指歸》的 “神明之理”	129
(六)徵實祛疑:王充《論衡》的“理”義	133
(七)心統群理:徐幹《中論》的主體 精神世界	136
結論	138

第三章

聖王:先秦“王道”義背景中的道術型範	146
敘引	146
原論	147
(一)從《尚書·洪範》溯源“聖”與“大同”義	147
(二)春秋、戰國的“聖王”義時代思潮的探索	152
1. 從《中山王方壺銘》說“聖王”義的 思想角力	152
2. 《左傳》、《國語》“聖王”義時代思潮 方向的考察	153
本論一 先秦載籍“聖王”義考察	156
(一)《管子》:聖王“心治”	158
(二)《晏子春秋》:“聖王之道”	160
(三)孔子之業	165
(四)《墨子》:彰“聖王”以治暴王	172

(五)《孟子》：“聖王”與《春秋》	177
(六)《荀子》：師法“聖王”	182
(七)《商君書》、《黃帝四經》、《韓非子》、《呂氏 春秋》與戰國黃帝治術：法令	185
本論二 漢初載籍“聖王”義考察	193
(一)賈誼《新書》：“聖王”治“大器”	193
(二)韓嬰《韓詩外傳》：“聖王”得“中”	200
結論	201

第四章

反本開新	207
一、孔子的治道	207
二、經藝與孔子的志業	211
三、《春秋》與素王	218
四、何休的《春秋》詮釋	230
五、經藝的人性本質	238
結論	243
徵引及參考文獻	245

第一章

王道：先秦、漢初“道術”原論

《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

——《漢書》^①

敘引 王官之學與德性自覺的進程

在中國思想的黃金時代，東周諸子異術而務經世，橫議治道政理，自由無拘，神采奕奕而各盡其至。雖然各自騰說，而旨歸不二。漢初劉安總論諸子百家的共同精神說：“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②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謂：“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③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乃繼孔子之後，系統整校傳世文獻，《太史公書》亦不啻為學術的通

① 班固：《漢書·刑法志》，頁1078。全書徵引文獻所據版本請參閱書末所附“徵引及參考文獻”，文內概不注出。

②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汜論》，頁434。

③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卷130，頁3288—3289。

史^①。漢初的共識，值得重視。經世的治道始終是諸子的關懷，出於深厚的社會責任感，透露出德性自覺的時代思想特點，是通觀中國思想的關鍵。張舜徽指出：“周、秦諸子之言，起於救時之急，百家異趣，皆務為治。”^② 呂思勉概括謂：“凡先秦諸子，莫不以均平貧富，使民豐衣足食為首務。其方法則互異。”^③ 說明諸子橫議道術，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出於對時代的關懷。追求公義，憧憬未來，懷抱美好的道德理想，是一股強烈的時代動力。

諸子百家的經世理想不是無端而來的。洶湧澎湃的道義思潮，必須具備相應的思想誘發元素。誘發一種強力的時代思潮，需要主客觀條件的配合。主觀因素指思想自身的衍生與變化，客觀因素指與思想相應的時代生態，包括傳統、政治、環境、社會與民族等等。班固《漢書·藝文志》溯源三代制度，於“王官”追蹤諸子思想的元素，說明學說的基本特性和限制，屬於客觀性的說明^④。這方法一直左右後人。胡適不同意，寫《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反駁《漢書》的說法，批評《漢書》混淆諸子之“學原”與“學術”^⑤，引起學界對“王官”的反思。鍾泰著《中國哲學史》以示抗衡，極言諸子之出王官，學術必本《六藝》^⑥。

① 逯耀東：《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

② 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頁1。

③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頁81。

④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頁117。

⑤ 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載《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頁593—599。

⑥ 鍾泰：《中國哲學史》，頁9—12。

金德建肯定孔子是學術演變的軸心人物，魯定公與哀公期間乃開始百家之學的時代，王官保存周代學術，《漢書》謂諸子出於王官，從學術流變的角度言，並不失真^①。朱寶昌先生《先秦學術風貌與秦漢學術》並持此論^②。牟宗三先生《中國哲學十九講》以“歷史”與“邏輯”兩方面解釋《漢書》的“出”義，認為胡適所以否定《漢書》的提法，是據“邏輯”思路理解；若據縱貫“歷史”的事實，則諸子之出王官是可以接受的敘述。現在的研究思路歧出此兩極，而大抵借助了經濟、社會、政治等時代客觀因素加以處理^③。其中社會上“身份自覺”的主體性問題論述得較深入。儒、墨、道、法四家“士人”的身份自覺，被視為學術思想勃興的重要因素^④，是東周的士人“自由投奔”的原動力^⑤，“道統”的意識由此確立^⑥。

牟先生提出：“士階層的興起並參與政治，中國的政治才有了客觀的意義，即政治之所以為政治。”^⑦ 士人橫議政情，為參與締造理想的政治環境而奮鬥。參與的意識表現為一股非我其誰的深層焦慮，可以是建設性的，但也可能成為鉅大的破壞力。士人如果沒有一種道德關懷及理性

① 金德建：《先秦諸子雜考》，頁1—7；頁28—53。

② 朱寶昌：《先秦學術風貌與秦漢學術》，頁12—19。

③ 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

④ 王長華：《春秋戰國士人與政治》，頁9。

⑤ 周繼旨：《論中國古代社會與傳統哲學》，頁227。

⑥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頁4—102。

⑦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頁179。

的自覺，隨時可能淪入瓜分現存生存資源的惡鬥，更不必耗費口舌筆墨於公義。身份轉移是生活世界的平常事，士人“身份自覺”的問題，乃需復原在場歷史情景中觀察，不能主觀論定^①。過度強調士人身份的外在特殊性與集團性，其弊端與強調階級鬥爭沒有分別。為避免思路極端偏向，正視思想活動之中的“道德”與“理想”的自覺及提昇^②，方得以顯示思想如何與時代互動的情態^③。從思想積極性的正面而言，士人必須堅持超越於物質享受的高層次人間關懷，則“身份自覺”便成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毅。否則區區於“大我”與“小我”的平面兩極^④，根本不足以解釋先秦諸子那股非我其誰的內在願力。進一步說，西周的宗法秩序便建立在明確的身份意識上，儒門論治，先重正名，以對治宗法失序的時代問題。“身份自覺”自身不一定產生積極的參與動力，更可能是離心力的根源，因為天賦才性的差異，並非跟身份成正比，有德而無位的人不在少數。如果欠缺道德上的自制，令原始的格鬥性轉向成為維護制度的積極建設意志，則必成為爭奪不已的下墜力，走向野蠻，更無從說立德立言等文明的累積。事實上，“士”的本字與“王”同，是大斧之形^⑤，取義於

① 王爾敏：《先民的智慧》，頁211—224。

② 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頁498。

③ 陳啟雲：《儒學與漢代歷史文化》，頁46。

④ 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頁70。

⑤ 林滄：《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載《林滄學術文集》，頁22—29。

統治權力的武力誅殺。若非商、周之際德性自覺，轉化“士”與“王”的原始暴戾意義為文明的建樹義，則孔子以來東周諸子的嚮往治道便成為無源之水。從參與的積極性來說，此“道德自覺”的與人為善的意念，較“身份自覺”的個人主義更為關鍵。理解諸子論治所蘊含的道德自覺，諸子的奮進精神自能深入體會，而免於隔靴搔癢。循此而進，諸子經世的懷抱可得而理解。促成思想發達的因素不一，強調“道德自覺”並不否定“身份自覺”以及各種客觀因素的解釋，因為所有解讀都能夠看到問題一隅，但因道德自覺而鼓動的參與感，毫無疑問更為根本。觀照諸子經世意識的根源，比較整全而活躍的勢態自能顯示。

班固“王官”論是從客觀制度解釋諸子思想淵源的，這觀察角度透露美化三代的意圖，明顯具有兩漢之際的時代思想特徵，不能謂錯繆。問題在於，班固“王官”是指有特定的職能官府，官守的是專門的知識。治事知識屬工具性思考，跟諸子治道有本質上的差異，難以轉出“經世”的目的性道義。“經世”目的在平治天下，帶有強烈的理想性，而非專司的官事，集中於處理事務的技巧與細節。這不是否定“王官”，而是考慮其對應關係。學術思想始終需要思想自身對應的繁衍，不對應便無法通感。如果沒有相應的思想元素，任身份如何清晰，也不能空生經世的道義意識。因此，誘導的思想平台極為重要。從道義意識最為直接的觸因點來看，六藝是平台所在。因為東周之言六藝，三代統治智慧賴以承傳，為諸子的共同學術基礎，而非專屬一家之學。諸子思想深處的強烈道德感，更

多的是從經年沈浸的六藝之中而誘出，道德的感召於潛移默化之間發育，而諸子之間的爭長，一浪高於一浪，不斷強化道義的作用。保存班固的說法，以“王官之學”代替“王官”——“王官之學”指守傳於“王官”的六藝及相關學問——而提出諸子出於“王官之學”，則更能把握諸子經世道義的源頭。

司馬遷稱“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①。錢穆稱六藝乃言孔子之學^②。認為六藝專屬於孔子的想法，是漢以後的事情。漢之前，“王官”守傳的六藝是士人讀書識字的途徑，非儒家專有。六藝之開啟諸子之學，學者早有所見。牟宗三先生強調六藝產生“意義”與“原則”^③。諸子思想論述的是“意義”與“原則”的目的性問題，而非技術性的細節。六藝是東周學術思想的共同平台，孔子則是平台上的先行者，引領後來者的方向，向德性之路進發，解除了專司性質的工具式思考的束縛，把思想引向光明的道義。

具體而論，書學於六藝之中與東周道術的關係更直接。書學系統之中，論治道則以《洪範》為核心。梁啟超強調《洪範》是“古籍中有系統的哲理譚，此篇為最古者之一”^④。方東美指出《洪範》與《周易》是令先秦宗教神

① 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卷61，頁2121。

②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83。

③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頁54。

④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66。

秘轉向理性思維的關鍵^①，儒、墨、道俱受《洪範》的啟發。運用比較宗教學的觀點解讀，《洪範》的“皇極”為房屋的主柱，乃向望天空的端標，極之上清明一片；皇是清明耀眼的意思，是踏出巫術神秘，而邁向光明理性的重要標誌，諸子的理性時代因“皇極”而開啟。經、子皆同出於人類嚮往光明理性的天賦，與尋求光明的意志的精神感召無本質差別^②。方先生通觀歷史，思路正大。《洪範》中殷遺臣箕子提出“王道”，一本深厚興亡之感，而其中深切的為政教訓，非徒紙上談兵，實親身的經歷。《太史公書》敘箕子過殷，而與民皆垂涕，其崇高的忠貞情懷，成為東周士人道德感召的共源。

孔子轉化西周“王官之學”為士人經世學術。從箕子至孔子，從孔子至諸子，是一條道德自覺之路，這是先秦學術的根本氣脈。通觀思想史，六藝深透東周的思潮，孔子賦予道義客觀意義，毫無疑問是典範。錢穆說諸子，首論孔子。朱寶昌先生稱孔子“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發端”^③；方東美謂孔子是先秦學術承傳的關鍵人物^④；牟宗三先生強調中國哲學必須從孔子起，孔子思想承負了三代的理想^⑤。孔子以來，天下滔滔，著書極難，受制於物質

① 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頁47。

② 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頁90—105。

③ 朱寶昌：《先秦學術風貌與秦漢學術》，頁1。

④ 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頁47。

⑤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頁51。

條件，倘非要務，不輕易著述。唐端正先生強調：“但由於彼此對應之時世不同，或着眼之觀點各異……不能相通，道術遂為天下裂。”^①其建立天下大法公義的“王道”^②，因《洪範》之啟示而著焉。六藝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核心。如果視東周諸子身處所謂“軸心時代”，而自傲於中國文明之得以組成世界的共同文明，則其思想的啟發本源，從孔子而及箕子所開出的目的性思考，自應正視。其中的公道論，更是“王道”的核心^③。諸子追求的“王道”大義，其中包涵極強烈的道德感，俱可於孔子見根源。戰國諸子與孔子之間，自具一種極深刻的德性感召。諸子之間雖然存在意見分歧，但都是在孔子的影子下發揮。沒有孔子，亦不能有諸子。有了孔子與諸子，則中國的思想大放光彩，後世歷朝學術主流的經學，皆緣此經世的美好意願而生。羅峻謂“子之與經，固同出而異名”，並謂“諸子皆稱道六經者”，“子學與經學旨皆淑世，名異而實通”^④。東周時代無所謂經學與子學，這是司馬遷以後的觀念，經為主而子為次，乃刻意軒輊。若解讀東周學術，當分曉受制不同時代學術生態之通孔，始見本來之相。經、子分途，乃權宜說法。超越後世目錄分類的成見，瞰視東周共同的學術平台上經與子的意義，方見出兩者精神上極

① 唐端正：《先秦諸子論叢續編》，頁1。

② 陳正燾、林其銑：《中國古代大同思想研究》。

③ 李振宏：《歷史與思想》，頁385—525。

④ 羅峻：《諸子學述》，頁88。